

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

白钢 主编

# 社会政治决策中的选择偏差研究

——“信息的选择性接触”视角

郑建君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

白钢 主编

# 社会政治决策中的选择偏差研究

——“信息的选择性接触”视角

郑建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政治决策中的选择偏差研究：“信息的选择性接触”视角 / 郑建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0

(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1642 - 5

I. ①社… II. ①郑… III. ①政治心理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1228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刘俊  
责任印制 张汉林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393 千字  
定价 6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国的民主实践与政治发展系列研究

## 研究成果之一

《“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因素分析》

## 研究成果之二

《中国公民的政策参与——北京、广东大学生问卷调查数据报告》

## 研究成果之三

《社会政治决策中的选择偏差研究——“信息的选择性接触”视角》

## 总 序

“选举”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从辞源学上诠释，选举就是择善者而举之。它作为公共行为，属于政治活动范畴。用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来分析，选举是一种具有公认规则的程序形式，其实质是人民主权的寄存过程。

“选举”这个词在中国出现很早，至少在汉代已被经常使用。《淮南子·兵略》中就有“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的说法；《汉书·鲍宣传》也有“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的记载。二十四史自《旧唐书》至《明史》皆有“选举志”。不过，中国古代的所谓“选举”，如西周之宾兴，<sup>①</sup>汉代之举孝廉及贤良方正，无论是“选士”还是“选官”，都与现代的选举不可同日而语。严格讲，中国古代的“选举”，实际上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选拔”，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需要，设定程序，挑选代理人的过程。换言之，选拔的实质是统治阶级“治权”的寄存过程，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是统治阶级的同意，而非人民同意。因此，选拔出来的人因其并非人民的代表而眼睛朝上，他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这是中国古代的“选举”与现代选举的根本区别所在。

在古代西方，如雅典和古罗马，有用选举形式来选择官吏、教皇甚至皇帝的传统，然而由于对选举权限制极严，而且是有组织地公开投票，所以即使平民参加选举，也改变不了贵族专政的实质，选举成为贵族阶级治权寄存的方式。不过，随着选举权的逐步放宽，民众选择的实质性要素已在中世纪的教皇选举会议和一些国家的议会中初露端倪。

---

<sup>①</sup> 语出《周礼·地官大司徒》。其云：“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注：“物犹事也，兴犹举也。民三事教成，乡大夫举其贤者、能者，以饮酒之礼宾客之，既则献其书于王矣。”

扩大选举权，在近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势力斗争的产物；在现代，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说过：“每当一个国家开始规定选举资格的时候，就可以预见总有一天要全部取消已做的规定，只是到来的时间有早有晚而已。这是支配社会发展的不变规律之一。选举权的范围越扩大，人们越想把它扩大，因为在每得到一次新的让步之后，民主的力量便有所增加，而民主的要求又随其力量的增加而增加。没有选举资格的人奋起争取选举资格，其争取的劲头与有选举资格的人的多寡成正比。最后，例外终于成了常规，即接连让步，直到实行普选为止。”<sup>①</sup>

扩大选举权，既是政府寻求民众对其合法性认可的途径，又是民众寻求选择政府的发言权的具体表现，其最佳形态便是普选权的彻底实现。普选权意味着只有公民选举产生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性。这既是一种政治理念，又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向世人宣示：公民有权选择政府。因此，普选权奠定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普选制的功能在于，周期地通过非暴力的、有序的方式，即公民普选的方式，实现公共权力机构的产生、让渡与更迭。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制度保障，它对于维护政治稳定和推动政治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是人民主权原则、社会契约原则以及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的实现形式，而且是公共权力机构运作过程中，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纠错机制、法治机制的制动杠杆。从这个意义上说，选举是民主纵向结构的起点。

不过在西方，取消对选举人的财产、教育程度、种族、性别等资格的限制，差不多花费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20世纪，普选制才陆续建立：北欧各国大体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普选制；英国于1928年议会通过《国民参政（男女选举平等）法》，实现了普选制；法国于1944年、意大利于1945年实行普选制；美国则是1970年尼克松总统签署了保证黑人选举权的法案，才算是基本实现了普选制。

现代中国不存在西方国家曾经有过的对选举人的财产、教育程度、种族、性别等资格限制的问题。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滥觞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直接选举制度的确立。这种基层直接选举制度，属于规范的普选制范畴，可以与任何国家的普选制相匹畴。

<sup>①</sup>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1页。

一般说来，选举制度是由一些基本规则组成的，包括：（1）确定选民和候选人的资格，如国籍、年龄、条件等；确定选民和候选人的基本程序，如选民登记与候选人的产生办法等。（2）选区的划分。现代选举是以一定的单位来进行的，一般的做法是以一定的地域为基本单位，称为“地域代表制”；也有采用“行业代表制”的，即按职业或行业划分选举单位。（3）选举方式，主要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虽然一般认为直接选举比间接选举更具民主性，但切不可把直接选举误认为是直接民主。纯粹的直接民主是指人民自己统治自己，是人民不间断地直接参与行使权力。直接民主根本不需要选举代表，更不需要选举官员，一切事情都由全体公民大会投票解决。投票不等于选举，简单地说，选举并不制定政策，选举只决定由谁来制定政策。凡需要选举代表的民主，都是间接民主，不管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4）选票计算制度，分多数代表制（又分为相对多数代表制和绝对多数代表制）和比例代表制两种基本类型。多数代表制规定，得票最多的个人或团体得到某个选区的代表席位；比例代表制规定，根据一定的政党获得的选票总数来确定当选人数。此外，还包括选举的具体办法和程序，如候选人如何竞选，选举费用的获得与使用，等等。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十分复杂，选举制度不同导致选举结果不同，里面大有文章可作。

从各国确定的选举制度来看，尽管某些基本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但如何在制度安排中体现这些原则，并落实到现实政治生活中，却表现不一。由此可见，选举是极为复杂的现象，它涉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因此，孤立地研究选举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把选举与政治结合起来研究。在国外，选举和公民投票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1949年，牛津大学的学者弗兰克·哈迪率先在英语中创造了“选举学”这一概念，1952年便出现在印刷品中。“选举学”涵盖了法律结构、选举制度、个人行为、候选人选择、政党与舆论媒介的竞选运动、民意测验、选举结果的统计分析以及选举地理学等重要命题，成为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一门显学。从理论上说，选举制度能够影响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当选举导致政府组成的交换时，新的面孔和能力便会给政治体制带来生机和灵活性，这也许是“选举学”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真正原因。

以发展基层民主为目标而兴起的农村基层选举和县、乡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选举，为开展以选举为切入点的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舞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家为此立项进行跟踪研究，并推出“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抛砖引玉，以期加深对中国政治变迁的理解。

“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以中外选举和中国政治两大主题为研究宗旨，编选相关的课题研究成果（包括专著、研究报告、译著和编著），系统探索选举政治与民主建设问题，为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已经出版两辑，从2009年开始出版第三辑。

“始生之物，其类必丑。”“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一定存在不少缺点甚至是错误，敬请方家先进不吝指教。

白 钢

2009年6月18日



# 序

今年5月，郑建君博士向我提及他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我便得知他有关“社会政治决策中的选择偏差”的研究专著马上就要完成，并邀请我为他的这部专著作序，我欣然应允。当我拿到书稿并陆陆续续阅读完之后，为建君的努力和整本书稿的质量而感到喜悦。

2010年4月，我与建君初识。那时他正处在博士毕业的求职阶段，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参加应聘的面试。在面试结束之后，我与所里其他同仁的感受相同，并一致认为：郑建君博士的学术训练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科研意识与能力，且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就已在本学科的重要刊物发表了20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是适合来政治学所工作的首选对象。随后，我代表所里同建君就是否愿意来所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那次谈话对我是印象深刻的，在有关开展政治心理与行为研究的基本认识上，我们两人很快便获得了一致的看法。期间还谈到了一项由我主持的课题的研究计划，建君很快响应并在随后的研究设计与实施上积极参与。现在，这一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我们两人还共同署名在2011年第6期的《政治学研究》上发表了相关数据的学术论文。基于对郑建君博士学养的总体判断和首次合作的效果及感受，我对本书的质量还是充满信心的。

郑建君来所工作之后，我经常与其就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沟通、交流，并鼓励他能够在政治心理与行为研究领域着力思考，在我国政治科学的量化研究发展方面有所建树。我之所以重视政治心理学和政治科学发展的实证化，其实是有一定原因的。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政治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有效分界“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具体而言，其实就是国内政治学研究从过多关注“是什么”向同时关注“做什么”和“怎么做”转化的问题。要实现这一转化，必须在政治学基本研

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和转变。我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规范性与经验性之争——试析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的文章（《政治学研究》1997 年第 1 期），系统介绍和分析了两种方法的异同、联系与区别，包括西方心理学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关系等问题。因此我假定，重视方法学的借鉴、多学科的综合可能会是这一转化有所突破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我还认为这一转化或者说政治学的未来发展还应当重视其服务功能，这一观点具体表述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年 10 月 8 日（第 18 版）刊登的《用政治学为国家 and 人民服务》一文当中。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和关注点应同时兼顾其实践层面，要研究面向中国实际的政治现象与问题。本书作者从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方法到整体架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我对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本判断，并让我平添了继续努力实践的信心；而建君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此收获，也足见其所作努力。总体而言，我认为可以将其研究的主要特点归纳总结如下。

第一，研究结构的全面性和实验问题的系统性。从书稿的整体来看，可以清晰地把握其基本结构，而这一结构又有序涵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模块。在理论分析部分，既有对信息选择性接触概况和社会政治决策基本观点的介绍、解释，又有对核心变量研究的理论基础、主客观影响因素等问题的深入延展，兼顾到了不同层次读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效果；而在实证研究部分，“一般性发生—特殊性演化”的推进路线，也进一步增强了实验结果支持的范围。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实证研究部分所涉及问题的系统性从实验任务的设置上得以有效体现。具体来说，既有常规情景下的普通决策任务，又有特定情景下的危机决策任务；既有涉及公共政策制定的一般性行政决策，又有涵盖人事选拔、突发事件处理等内容的特定性管理问题。这些内容的全面覆盖和系统分析，使得整个研究在生态效度和成果推广迁移方面都得到增强。

第二，研究切入的现实性和实验设计的独立性。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决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例如公共政策制定、法案修正、政治参与、西方的竞争性选举等，都涉及本书提到的政治决策和信息选择偏好问题。正如上文所提及的，政治学的研究和关注点应同时兼顾其实践层面。本书的研究切入，恰恰遵循了学术基础研究和政治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研究的整体设计上没有局限于“社会认知偏差”这样一

个纯学术性概念，而是始终依托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具体现象——决策行为来展开，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决策任务向读者展现信息选择性接触行为的普遍性、具体条件、影响机制、间接效应和特定变化等向度，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学理性研究也可以如此自然地嵌入于社会政治的实践性问题。就实验设计的独立性而言，研究者在问题导入、变量考察、实验范式、结论分析等方面并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欧美学者的既有模式，在每一个具体的实验中都能够看到研究者对设计细节和实验目的关系的思考。例如对决策聚焦操作的变化、对情绪调节资源的控制方式、从思维模式特征来提出研究问题、危机决策情景的引入等，这些都体现出了我所说的独立性特征。

第三，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实验分析的合理性。在政治学科的相关研究中，也有一些研究成果是涉及政治决策的。在不涉及学科关注倾向的前提下，政治学科的研究方法多采用制度分析和逻辑思辨的套路，这种方式在褒扬灵活性的同时却又无法兼顾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由于本书所涉主要内容皆具政治心理学的基本特性，因而在研究方法上也秉承了其母体学科之一——心理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传统，通过大量实验对研究问题背后的机制进行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同时，作者还在附录中提供了完整的实验材料与测量工具，这也为其他研究者对本书实验结果的重复检验提供了可能；而这种研究方法的选用在国内政治学科的研究中是很少见到的。在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与推导上，作者也极力遵循实证研究的基本要求，以一种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结果，这不单单表现在对结果的解读分析方面，也表现在对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处理方面，包括对多种情况可能存在的结果差异作者都进行了不同的统计处理比较（例如该书第八章实验一、第九章实验二等），其精细可见一斑。

上述三个方面是我对整个书稿研究特点的简单概括。作为国内第一本专门针对“社会政治决策中的选择偏差”问题的研究专著，同时也作为国内学者采用实验方法开展政治心理与行为领域的系统性研究尝试，郑建君博士这一研究成果的出版，其意义和作用必将是重大的。当然，本书得出的既有成果肯定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提升、改进的空间；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本书的认可与积极推荐，因为任何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改善、臻至完美的过程。因此，我也希望本书作者能够继续深入对该领域的研究探索，持续跟进、大胆创新，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取得对该问题研

#### 4 社会政治决策中的选择偏差研究

---

究的更大成果。

是为序，肯定同时，亦为鼓励！

房宁<sup>①</sup>谨识

2012年7月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

<sup>①</sup> 房宁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治学系主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 前 言

决策作为个体复杂的心理与行为过程，始终伴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学习与工作当中，并成为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信息科学和其他学科的关注重点。<sup>①</sup> 决策研究最初所遵循的标准化范式将人类视作是完全理性的个体，认为个体在决策过程中能够精确计算各类决策结果并对其可能的影响做出评估。然而，人类并非无情感、无意识的计算器，其思维过程也不可能像执行程序那样简单、直接，个体的决策常常会表现出有限理性甚至是非理性的特征。<sup>②</sup> 以心理学家所推崇的描述性范式开展的决策研究相继提出了“有限理性”、“前景理论”、“损失规避”等理论观点，并将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可能表现出的各类决策偏差作为该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对个体决策偏差的研究分析，不仅能够更为有效地了解人类思维模式、问题解决过程和如何做出决策，而且还将有助于我们改进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的能力，在现实世界中避免因决策偏差所带来的各类损失。

在关于决策偏差的分类与解释上，Jonathan 将其划分为注意性偏差、

---

① Gigerenzer, G. (2004), "Fast and frugal heuristics: The too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In D. J. Koehler & N. Harvey (Eds.), *Handbook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pp. 62 - 88),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②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313 - 327;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82), "The psychology of preferences." *Scientific American*, 246, 160 - 173; Simon, H. A. (1986), "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Business*, 59 (4), 209 - 224;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91), "Loss aversion in riskless choice: A reference-dependent mode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1039 - 1061.

动机性偏差和心理物理性失真扭曲三类。<sup>①</sup> 在注意性偏差中, 对新近或固有事件属性的关注 (如赌博中的偏好翻转、计划谬误等)、对相关属性理解的偏误 (如赌博谬误、事后诸葛亮效应等) 以及对事物某属性关注的遗漏 (如关联效应、固定馅饼假设等) 等都能够造成注意性偏差; 动机性偏差是指由于对已有目标或愿望的相关信念所产生的决策倾向效应 (如选择性接触、<sup>②</sup> 首因效应等); 而心理物理性失真扭曲则是由事物物理特性与相关知觉之间的偏差造成 (如确定性效应、动态不一致性等)。有鉴于决策偏差领域关注范围广泛、研究解释复杂等特点, 我们不可能在相对有限的个别研究中统统囊括。因此, 作者在本书中将选择动机性偏差类别中的选择性接触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验证性偏差效应予以重点关注和系统分析。

个体在社会政治决策中对信息的选择常常伴随有系统性的偏误, 其选择结果往往会偏离正确决策的指向而表现出与个体已存态度、信念和行为等相一致的倾向, 我们将这种倾向或行为称作个体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 而由此产生的偏差即为验证性偏差效应。<sup>③</sup> 选择性接触和验证性偏差作为个体复杂的心理、行为效应, 已有研究者对其发生条件、程度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相关的结果。在本书所涉及的研究中, 我们将以中

---

<sup>①</sup> 参见 [美] 乔纳森·巴荣 (Jonathan Baron) 《思维与决策》, 李纾、梁竹苑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48—51 页。

<sup>②</sup> 在李纾、梁竹苑 (2009) 所译《思维与决策》一书中, 将 selective exposure 一词译为选择性暴露,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 selective exposure 主要指个体在信息的搜索过程中受到其原有观点、立场、信念和 (决策) 行为等的影响, 因而会更多地或偏好于选择那些与自身既有观念相一致的信息。因而, 采用“选择性接触”的表述可能更为准确地反映了“selective exposure”所体现的心理与行为含义。

<sup>③</sup> Frey, D. (1986), "Recent Research on Selective Exposure to Information."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9, pp. 41–8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art, W., Albarracín, D., Eagly, A. H., Brechan, I., Lindberg, M. J., & Merrill, L. (2009), "Feeling Validated Versus Being Correct: A Meta-Analysis of Selective Exposure to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 (4), 555–588; Sears, D. O. (1965), "Biased indoctrination and selectivity to exposure to new information." *Sociometry*, 28, 363–376; Smith, S. M., Fabrigar, L. R., & Norris, M. E. (2008), "Reflecting on Six Decades of Selective Exposure Research: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 (1), 464–493.

---

国被试为研究主体，采用实证范式的实验室实验方法对相应的研究结论予以检验（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在常规决策情境的验证基础上，引入危机决策任务来进一步明确选择性接触的发生以及相关变量对验证性偏差效应的影响（本书第八章）。同时，本书还将自我价值定向理论这一本土化社会心理学理论作为本书第九章的研究基础和备择解释框架，一方面从新的视角对相关变量与影响作用予以解释，另一方面也将对自我价值定向理论的适用效力和内容予以检验与丰富完善。

# 目 录

<b>第一章 信息的选择性接触概述</b> .....	(1)
一 初识选择性接触 .....	(1)
二 选择性接触研究的发展历程 .....	(6)
(一) 研究初起阶段 .....	(6)
(二) 研究中衰阶段 .....	(8)
(三) 研究恢复阶段 .....	(10)
(四) 研究复兴阶段 .....	(13)
三 影响选择性接触发生的基本条件 .....	(17)
(一) 信息加工的动机与能力 .....	(17)
(二) 信息加工的目标 .....	(18)
<b>第二章 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b> .....	(21)
一 现有的理论工具 .....	(21)
(一) 认知失调理论 .....	(21)
(二) 动机理论 .....	(25)
(三) 普通认识理论 .....	(34)
二 其他的理论视角 .....	(37)
(一) 恐惧管理理论 .....	(38)
(二) 自我价值定向理论 .....	(42)



<b>第三章 选择性接触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b> .....	(48)
一 客观因素 .....	(48)
(一) 备择信息数量 .....	(48)
(二) 备择信息呈现形式 .....	(50)
(三) 决策框架 .....	(52)
二 主观因素 .....	(55)
(一) 信息搜索过程中的聚焦 .....	(55)
(二) 态度强度 .....	(57)
(三) 信息加工能力与目标 .....	(59)
(四) 情绪因素 .....	(62)
(五) 自我调节 .....	(64)
三 其他因素 .....	(67)
<b>第四章 社会政治决策中信息的选择性接触行为</b> .....	(70)
一 社会政治决策概览 .....	(70)
(一) 决策及其理论简介 .....	(70)
(二) 社会政治决策及其特征 .....	(74)
二 认知动机与政治信息的选择性接触 .....	(78)
(一) 态度认知与信息加工偏差 .....	(78)
(二) 态度认知与信息的选择性接触 .....	(83)
(三) 动机推理与信息的选择性接触 .....	(87)
三 权力因素与政治信息的选择性接触 .....	(89)
(一) 权力对信息加工的影响 .....	(89)
(二) 权力与信息的选择性接触 .....	(91)
(三) 威权主义与信息的选择性接触 .....	(94)
四 大众传媒与政治信息的选择性接触 .....	(96)
(一) 传统媒介中信息的选择性接触 .....	(96)
(二) 政治文宣中信息的选择性接触 .....	(100)
(三) 新兴媒体中信息的选择性接触 .....	(104)